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

第五辑

薛绥之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

第五辑

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

B

鲁迅与其他文学社团、报刊的关系

鲁迅与创造社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回到上海，当时创造社在青年中是有影响的，我打算和鲁迅共同恢复《创造周报》影响青年。蒋光慈也同意了，通过郑伯奇、蒋光慈向鲁迅先生讲，鲁迅也很高兴和创造社一道联合作战（见《两地书》）。当时还登过广告呢。一九二七年冬天，上海《时事新报》有一则恢复《创造周报》启事，第一名是鲁迅，第二名是麦克昂（我的代名），第三名是蒋光慈。创造社后期，彭康、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等在日本，受了福本和夫的影响，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商量以创造社为基础，举起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时代，为了更好地工作，我主张隐蔽一些。成仿吾和后期的几位同志都不赞成我的看法，我没有坚持。不久，我出国了，他们结果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了。内部发生了矛盾，这是一个小曲折。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创造社被国民党封闭了，也可以说结束了它的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的任务。

——摘自戎笙整理《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载

《文学知识》1959年第5期。

大革命失败以后，各地反动势力大兴党狱，疯狂逮捕屠杀，全国骚然。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毅然决然参加革命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投入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同时，许多进步作家和革命知识青年从各地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蒋光慈、段可情、黄白薇等先后都来了。创造社成了大家经常出入或临时安身的地方，一时顿形活跃。不久，鲁迅先生也由广州来上海。年底前后，沫若同志参加南昌起义，行军潮汕以后，也经由香港回到上海。我们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政治革命暂时受了挫折，先从文艺战线上重整旗鼓，为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准备条件，岂不很好吗？蒋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刻欣然同意。他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我们都很高兴。沫若也表示非常欢迎。我为此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先生。这计划曾由鲁迅和沫若领衔发表过启事。后来因为仿吾和在日的创造社同人另有主张，这计划没有实现。

我们在上海和鲁迅先生谈联合计划的时候，仿吾已去日本。他去日本是想和初梨、乃超等同志商谈今后创造社活动的方针的。我和仿吾谈过在日本的同志们主张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仿吾很兴奋。我们本来就觉得创造社的人力单薄，达夫离开以后，更希望有生力军参加。初梨、乃超已经发表过作品。彭康、镜我研究理论有成就，现在大家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这对于创造社的前途有很大关系，仿吾决定亲自去日本跟他们谈谈，以便制定今后的活动方针，请他们回来共同来搞。我和他

们先后同学几年，知道他们在创作方面和理论方面各有专长，更希望他们回来，充实创造社的力量。仿吾要去日本和他们当面商谈，可说是我们上次在京都交换意见的结果，我非常赞成。不过当时他们正在读大学二、三年级，要回国就非半途退学不可，这是我们担心的一点。不料，仿吾到日本和他们商定了计划以后，大家都愿意退学回国。仿吾来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都很高兴，以殷切的心情等待他们。沫若和我都同意仿吾的新计划，以前酝酿的联合计划因而无形作罢了。不过此事未向有关各方面作妥善交待，当时由于我的疏忽，遂致引起了许多误会。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歉仄。

一九二七年底，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和李铁声五位同志回到上海（李铁声同志原名李声华，三高理科毕业后，刚转入大学文科一年，激于革命热情，也自动退学，一道回来了）。我们在甯乐安路纪家花园找到一座清静的小院落，让新回来的同志一起住在那里。沫若同志在他秘密的环境也和大家见了面，交换了以后工作的意见。现在只等仿吾一回来，就着手改革，开始创造社后期（也可以说第三期）的活动了。

.....

现在谈一下创造社和鲁迅先生的笔战。这场笔战是由创造社作者的几篇文章引起的。乃超和初梨的两篇论文特别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反击，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载《文化批判》创刊号）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二号）那篇论文里，不仅批评了鲁迅，也批评了郭沫若和蒋光慈。此外，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那篇文章里也触犯了鲁迅先生。平心而论，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缺

点。对于当时文学界的分析和对于当时著名作家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特别是对于鲁迅先生五四以来的战斗成绩重视不够，而批评的态度又不够严肃，这些都是引起鲁迅先生反击的原因。说老实话，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引起那样一场严重的论战。论战开展以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这样就使鲁迅先生感觉到受了“围剿”。其中某些作者推波助澜，更使论战发生了偏差。幸亏党及时加以纠正，这场论战才告结束。现在回想起来，这场笔战不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运动所以发生这种偏差，我觉得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因为当时革命斗争非常尖锐，人们无暇分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况创造社搞起革命文学运动，完全出于自发，最初没有得到党的正确领导，错误更是难免的。其次，我们出国时间较长，对于当时国内文学界情况不太了解，而又缺乏调查研究，因而在国内文学界的分析、评价方面不能完全正确。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场可以避免的笔战就不免发生了。

在这里补叙一下沫若同志的意见也许还是必要的。在对鲁迅先生展开批评之初，沫若就曾为此提醒过初梨。在以麦克昂的笔名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一文中，他以为语丝派的文学家是“不自觉”，“或者有一部分（这里无疑地包括鲁迅——笔者）是觉悟而未彻底”，“实践上”“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他揭露新月派的徐志摩“才是有意识的反革命派”的“文学小丑”，“不仅在文学上是反革命，他所有一切思想行动都是反革命。”沫若的这种认识是他从长期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历史证明，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小丑一直是革命文学、进步文学的最顽强的死敌。对于鲁迅先生的评价虽然还显得不够全面、不够充分，但他明确地告诉我

们要分清敌友。创造社和鲁迅的论争，按照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原则来看，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而达到团结，而不应该发展成为无情的斗争。可惜论战开始，执笔的人就没有很好的掌握分寸，又有一些人从旁推波助澜，以致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严重的论战。这一论战我没有参加，主要因为自己曾和鲁迅先生商谈过合作，不愿介入，并不是自己有什么明确的思想认识。

总之，这次论战是有缺点的。但它却起了积极作用。论战的展开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注意，特别对文学青年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论战，鲁迅先生研究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翻译苏联文学作品，集合革命青年发刊鼓吹革命文学的杂志，因而加强了革命文学的力量。这样就给革命文学阵营的团结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初，在党的领导下，鲁迅先生和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的成员联合起来，组织了“左翼作家联盟”。

——摘自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载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8月版。

前期创造社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它的成员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为核心，包括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何畏、王独清、陶晶荪、穆木天等人，出版的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还有其他一些小刊物。除上述人员外，还有一些年轻的，通常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的人们，他们是黄药眠、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邱韵铎等，还有张立村、梁预人、黄祥光……等一批搞后勤工作的青年。创造社初期，依靠出版商人泰东书局老板的帮助，开始活动，但当时中国的

殖民地经济还不可能为新文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养分，作家与老板之间关系搞得不好，后来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这说明了当时搞文化运动的艰难。到一九二六年，即所谓创造社的第二阶段，出版部的年轻一辈出版了《洪水半月刊》，向当时的广大青年读者提供了争鸣的论坛，真是盛极一时。郭沫若认为这“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

创造社的后期大约可以由我们五个人应成仿吾的邀请（也可以说受到他的鼓励）回国以后算起。我们五个人是朱镜我（原名德安）、李初梨、彭康（原名彭坚、字子劼）、李铁声（原名声华）和我。但以后又陆续回来了一些人，他们是王学文、傅克兴、沈起予、许幸之、沈叶沉（《文化批判》第二期以后的封面是他设计的）；郭沫若又介绍了李一氓和华汉。创造社前期的人仍然参加活动的，是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陶晶荪等。成仿吾当时的积极性，是颇受指责的。但他是我们回国参加文化工作的推动者，当然更大的推动力则是革命形势的新发展。我个人倒是高度评价成仿吾这次日本之行的，他不仅找了我们几个人，事实上他当时在东京与京都两地找过的人是相当广泛的。创造社进入第三阶段时，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能不在反共与拥共之间做出更明确的选择和表态，不管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少的认识。记得一九二七年暑假前我从东京到京都访问李初梨，他引我去京都帝国大学讲堂参加一个由中日学生出席的大会。对象可能主要是日本听众，李用日语讲演，最后一句话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将因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染得更加鲜红。”这是国民党左派转向中国工农革命者的思想反映，这句话经过了五十一年，我仍留下鲜明的印象。成仿吾当

时的马列主义知识当然不会很丰富，北伐时期他在广州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但他并不游离于革命运动之外，则是事实。……

我们五个人情况虽然不尽相同，学的专业也各色各样（郑伯奇的一篇谈话记录，对此有些错误，但非重要问题，整个来说，它反映了创造社内部的斗争，是可贵的资料），但我们都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共同想法。至于在文化领域内反对什么人，批判那些思想，我们的认识不是那么明确的。诚然，在《文化批判》中，朱镜我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国内对象是郭任远之流，这篇文章得到瞿秋白的肯定）；彭康写了一篇批判“人生观论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得到郭沫若的赏识，称彭为“后起之秀”）；李初梨介绍了自然生长论与目的意识论这样一篇有针对性的文章。但并不等于说《文化批判》的出版是很有计划的，其实我们对于当时国内整个文化界情况并没有较多的知识，或进行过详尽的分析。至于联合什么人；更是心中无数的。鲁迅对此曾做过原谅的批评，说我们“是未经过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是符合事实的。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杂志《文化批判》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了它的创刊号。

真没有想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竟是我们和鲁迅论战的大半年。人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说我们早就有计划要打倒鲁迅的，或者认为成仿吾有意组织我们回国来“围剿”鲁迅的。可不是吗，在仿吾赴日前创造社前期的几个人郭沫若等曾有过联合鲁迅恢复《创造周报》的想法，并公开刊登了启事；但当我们回国后，这个联合鲁迅的计划突然烟消云散了。这不能不引

起疑问。应该声明，我们的确没有反对过联合鲁迅的主张。从我个人的记忆来说，我们在回国前后都没有听说过这段准备联合的消息，仿吾也没有和我们谈起这件事，起码我个人对此事的印象就是如此。

从另方面说来，鲁迅对这番变卦，想来不但会感到突然和不可理解，可能还感到痛心的。早在广州时期他就有联合创造社共同作战的念头了，觉得那时期创造社还能在一起作点事似的，但居然事情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竟然出现于他在广州经历了使他“目瞪口呆”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对创造社的所作所为能够理解吗？能够原谅而不发生误会吗？这使他对成仿吾以及创造社“元老”们，所谓“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旧业的旧文人”的成见就更大了。郑伯奇说他没有对联合战线归于失败的问题向鲁迅进行解释感到内疚，但如果我们懂得有必要去解释又能解释，那就不会产生分裂，也不会进行论战了。但事实上经过论战后的，即分裂后的统一，不是更好的统一吗？其中没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吗？象冯雪峰那样后来对党的文化工作，特别在把党和鲁迅的关系沟通起来作出过贡献的人，也不免反复强调创造社的宗派性，把这次分裂的责任归咎于创造社，特别归咎于创造社“元老”们，但他们是无辜的，郭沫若当时（一九二八年一月）就指出：“文坛上的斗争渐渐到了一个第二阶段了。从前的斗争只是封建式的斗争，是以人或地理上的关系为背景。目前的斗争是进了一步，我们是以思想、行为及一切阶级的背景为背景。拜金主义派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见《桌子的跳舞》，《沫若文集》卷十）这个敌人当然指的是新月派之类。我也记得郭沫若曾说过：我们不想批评鲁迅，应批新月派。这意见可能是郭自

己的，也可能出自当时党的上层领导同志。后来，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月社，彭康写了文章，我也写了。

创造社当然不是没有宗派情绪的，但只能说是“文人的小集团主义”，把它夸大为“宗派主义”，甚至说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更是不应该的。冯雪峰做出这样的论断的根据之一就是因为《创造月刊》二卷一期刊登了杜荃的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一篇文章。杜荃是不是郭沫若？我过去认为不是的，郑伯奇也认为不是的。但仍有不少的人来访，多半都肯定是郭沫若。我曾试图弄清楚它。由于郭沫若一直在患病，不大见客，是不宜于拿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候去打扰他。拖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同几个同志到他家里去，看他精神比较好些了，便问他曾否用过杜荃这个笔名。他有点茫然的样子在回忆后说：他曾用过杜衍、易坎人……的笔名，杜荃却记不起来了。后来我托他的秘书找出杜荃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思潮》上的那篇《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请他看，他看过后说，该文的观点和他相似，但也没有说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杜荃这个人还没有找出来，问题当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我没有为郭沫若掩盖的企图，文章既然发表在《创造月刊》以及和创造社有渊源的《新思潮》，则杜荃与创造社有关系的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点根据。《沫若文集》还在，新版将要重新编辑，将来可能找出结论来。

要说郭沫若和鲁迅之间没有“曾用笔墨相识”的事，是不符合事实的。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中，有“发端”的一段文字，他亲自做了注释：“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点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

好在我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郭沫若对鲁迅的尊敬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所写的文字中或演讲中，找这样的例子是并不困难的。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他作了《大哉鲁迅，前无古人……》的演说，不是很好的证明吗？“发端”这部分文字，原来是独立一篇文章，在日译版本中似乎叫《葛洛茨基列传》的（日语Gorotsuki是流氓的意思）。这篇文章作为“发端”保留下来是对的，如果删去了则鲁郭之间曾有过“笔墨相讥”的事实也被抹杀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来，即使杜荃是郭沫若也不见得是大问题。能说鲁迅对创造社一点儿误会都没有吗？……

说到鲁迅和创造社的关系，他对成仿吾的批评态度占着突出的地位。一九二七年以前，鲁迅对成仿吾早就有了一定的看法，主要是在文艺见解上的分歧。《文化批判》问世后，他对成仿吾的批评就变得相当苛刻了。说批得苛刻，我并没有否定鲁迅对我们的批评有其合理核心。但把成仿吾封为“元帅”、“总司令”……等等的说法，是和我们不自觉地破坏了鲁迅与创造社之间本来已经成熟的联合机运有关，反映出鲁迅当时的沉重心情。他指责成仿吾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以及“十万无烟火药”一类的话，为后来批评成仿吾的人们所乐于引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统治时期，我在《人民日报》和一些省级党报上先后发现几篇引用上述字句来批评成仿吾的。拿这些表面现象的片言只语来概括成仿吾的历史，那是很不适当的。

——摘自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编者附记：1981年出版的十六卷《鲁迅全集》，对《三闲集·序言》所作的注⑧中，已确认杜荃即郭沫若。

附：

《创造周报》复刊广告

创 造 周 报

编 辑 委 员 成仿吾 王独清 郑伯奇 段可情

特约撰述员 鲁 迅 麦克昂 蒋光慈 冯乃超

张资平 陶晶孙 赵伯颜等三十余人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时事新报》

创造周报复活了

一、复活预告

时代滚滚地流去，转瞬之间，在我们的文艺界瞌睡着的当中，时代又已经前进得离我们很远了。文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头，至少也得跟在时代的尾后前进。可诅咒的瞌睡，可耻辱的落伍！我们不甘于任凭我们的文艺界长此销沉，任凭我们的文艺长此落后的几个人，发愿恢复我们当年的、不幸在恶劣的环境中停顿了的《创造周报》，愿以我们身中新燃着的烈火，点起我们的生命于我们销沉到了极点的文艺界，完成我们当年未竟的志愿。我们的文学革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今天要根

据新的理论，发扬新的精神，努力新的创作，建设新的批评——我们将在复活的《创造周报》开始新的简册。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我们的休息已经告终，我们决在十七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再与诸君相见。亲爱的朋友们哟，请听，请听；我们卷土重来的雄壮的鼙鼓！

二、编 辑 委 员

成仿吾 郑伯奇 王独清 段可情

三、特 约 撰 述 员

鲁 迅	蒋光慈	张资平	陶晶孙
穆木天	赵伯颜	潘怀素	麦克昂
李初梨	冯乃超	彭 坚	李白华
李声华	袁家骅	许幸之	倪貽德
敬隐渔	林如稷	夏敬农	黄药眠
杨正宗	孟 超	张牟殊	杨邨人
黄鹏基	张曼华	高世华	聂 畸
邱韵铎	成绍宗等		

——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28年1月1日出版。

编者附记：《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刊载《创造周报复活了》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版本。

鲁迅与《奔流》

许广平、郁达夫、靳以的回忆

他初到上海，以编《奔流》花的力量为最多，每月一期，从编辑、校对，以至自己翻译，写编校后记，介绍插图，或亲自跑制版所，及与投稿者通讯联系，代索稿费，退稿等等的事务工作，都由他一人亲力亲为，目的无非是为了要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这就占去了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其余为各刊物写文章，总觉得时间有限。同时，他也不排斥创作，白薇女士的《打出了幽灵塔》的长诗，鲁迅就分期给予刊载。为读者与作者设想，这里，鲁迅是颇费了一点心思的。他曾说：“这样长诗，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的，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这是他同情一个作家，就不惜极力援助她了。而鲁迅又同情杨骚为朋友的热心，他有时就开玩笑地说：“我编排他们的稿件，不是杨骚在前，白薇在后，就是白薇在前，杨骚在后。”

——摘自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版。

初到上海的时候，他经常给《北新月刊》写稿及译《近代美术思潮论》，自己又编《奔流》和《语丝》，后来《语丝》请柔石先生代劳，他就给“朝花社”计划一切出版事业：除了选择译稿的材料，计划书面装帧，或自己执笔之外，做铀版了，也是要他选材料，跑制版所的，有些制版所因为他的生意相当忙，

而且样子又质素，认为是跑街之流的人物，特别给他一个九折。

——摘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娱乐》

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摘自郁达夫《回忆鲁迅》，收入《回忆鲁迅及其他》

记得先生编辑《奔流》时，每期他都要写编后小记，虽然没有几个字，却能扼要地说出所刊文章的精义，如是译文的话，更说出原作者的思想与文章的要点。

——摘自靳以《忆鲁迅先生》，收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册》

鲁迅先生与《奔流》月刊（节录）

包子衍

筹办《奔流》的经过

关于鲁迅先生与郁达夫合办《奔流》的最早文字材料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他给章矛尘信中的一段话：“五月间，我们也许要出一种期刊玩一下子。”……

……

他们在三月十四日以前已经商量好了，接着就开始筹划准备。这时，鲁迅先生既要编辑《语丝》，又要回击创造社等的攻击，还要译校《思想·山水·人物》，所以工作很繁忙，五月创刊的计划不得已往后推迟了。他在五月四日给章矛尘的信中说：“和达夫同办的杂志，须六月间才可以出。”（见《鲁迅

书信集》第188页)从四月中旬到七月中旬三个月的时间中,他几乎没有为别的刊物写过文章,主要力量就放在编校《奔流》以及为它撰译稿件上。五月上旬他又生了病,一直病到月底。就在病中编完创刊号,校阅清样,补译文章,撰写《编校后记》和《凡例五则》。他在五月三十日给章矛尘的信中说:

“我并不‘做’,也不‘编’。不过忙是真的。(一)者,《思想·山水·人物》才校完,现在正校着月刊《奔流》,北新的校对者靠不住,……(二)者,有些生病,而且肺病也说不定,所以做工不能象先前那么多了。”(见《鲁迅书信集》第189页)就在他辛勤、坚韧的劳动下,《奔流》月刊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诞生了。

编辑《奔流》的情况

《奔流》“也是译文多”的一种月刊,(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致翟永坤》,见《鲁迅书信集》第191页)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五本《奔流》中共发表稿件146篇,其中译文八十七篇,占百分之六十弱。而在译文中,鲁迅先生特别注意介绍有关苏联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他翻译的《苏联的文艺政策》及附录就连载三十九期。……

《奔流》并不排斥创作,它先后发表了许钦文、柔石、黄白薇、罗西、张天翼、白莽等青年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

鲁迅先生怀着一颗“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见《鲁迅书信集》第250页)一贯希望在文艺战线上“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全集》卷三第185页)他在编辑《奔流》中,也注意对新生力量的培养。象白莽最初不过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热爱彼得斐